

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

张留学 郭德欣 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JINDAIXUE
SHENGYUNDONGSHI
ZHONGGUOJINDAIXUE
SHENGYUNDONGSHI
ZHONGGUOJINDAIXUE
SHENGYUNDONGSHI

Z G J D X S Y D S

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

张留学 郭德欣
徐有礼 郭晓平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中国学生群的产生	(1)
一、中国新式学校学生的产生	(1)
二、中国近代留学生的产生及近代学生群的特点	(12)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	(24)
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热潮	(24)
二、青年学生在政治上的活跃	(31)
三、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42)
第三章 中国学生运动的新开端	(56)
一、中国学生的新觉醒	(56)
二、五四运动——中国学生运动的新开端	(71)
三、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传播	(97)
第四章 旅欧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12)
一、旅欧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112)
二、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斗争	(121)
三、旅欧少共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	(131)
第五章 大革命前后的学生运动	(141)
一、大革命前的青年学生	(141)
二、大革命高潮中的学生运动	(157)

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	(182)
第六章 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
一、“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起伏	(194)
二、“一二·九”运动	(209)
三、“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227)
四、“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	(251)
第七章 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青年学生	(257)
一、奔向民族解放战争前线的先锋	(257)
二、抗日民主运动中的英勇战士	(278)
第八章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青年学生	(293)
一、国统区学生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93)
二、国统区学生反美争和平民主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	(324)
第九章 青年学生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战斗	(356)
一、团结战斗迎解放	(356)
二、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378)
结束语	(394)
后记	

第一章 近代中国学生群的产生

一、中国新式学校学生的产生

源远流长的中国 古代学校教育

“学生”一词，溯其词源，最早出现于我国古代的《庄子》一书中。《庄子·达生》篇中有“善闻祝肾学生”。但这里是指学习养生之道。把在学堂或学校里读书的人称为“学生”，则始于《后汉书》，在其《灵帝记》篇中曰：“（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由此可见，现在所讲的学生，是和学校教育密不可分的。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学校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夏代，传说我国就已经开设学校，进行教育。据甲骨文和古书记载，殷商时代已出现了正式的学校。到了周代，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已有国学和乡学两种。因此，《汉书·儒林传序》说：“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校、庠、序就是当时的学校名称。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学校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到秦汉之后，学校不仅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而且还出现了“私学”。尤其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立太学后，我国就出现了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高等学府（虽然商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大学的初级形式，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大学应从汉武帝创立的太学开始）。在武帝时，太学生仅50人，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时增至1000人，成帝时增至3000人。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于光武五年（公元29年）又建太学于河南洛阳，建太学博士舍，修内外

讲堂，使太学规模较前更大，形成“诸生横巷”的盛况。至东汉末期，太学生已达3万余人。^①此外，从汉代起，已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如汉平帝时就明确规定，郡设学（国学），县设校，乡设庠，聚（村）设序。同时，“私学”在汉代也颇繁盛。有相当于太学的，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有教儿童的小学，称为“学馆”、“书馆”或“书舍”等。自汉代起，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管曾出现过短暂的衰落现象，但总的来说是日益发展。隋唐时期专门学校的出现，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比较完整的系统。尤其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君臣鉴于唐末五代武人的割据专横，遂寄希望于科举取士上。当时北宋名臣范仲淹将科举取士与推行儒教结合起来，在庆历年间数言兴学校，并得到皇帝的重视与宋祁等近臣的支持，于是宋代出现了“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的繁荣局面。后经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之手，将学校、读经、科举一条龙作为制度确定下来，一直延缓到明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养士”，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隋唐兴科举之后，这种学校教育只能造就旧式文人或士大夫。而近代中国的学生群，她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则是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众所周知，自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大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使中国古老的社会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历来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随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演变和

^① 参见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182页。

阶级关系的变化，我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也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并由此产生了区别于封建教育制度的新式学校和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学生。

教会学校产生了最早一批新式学生

1840年，英国侵略者依靠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如狼似虎般扑向中国。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它们除了使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之外，还在思想文化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

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岛屿设立学校，作为向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基地。1818年9月，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教授英文和中文（该院1842年迁至香港）。1839年11月，由广州、香港等地的教士和商人发起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创办了一所“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至香港），由美国基督教徒布朗担任校长，开设的课程除中文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历史、地理、英文等，并曾开设过化学课。容闳、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和唐杰等六人为该校第一批学生。“马礼逊学堂”是外国人在我国设立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845年，外国传教士在华者有31人，1848年增至67人，1855年，增至75人。这些传教士除传教外，大多数都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92—593页。

兼办教育。当时比较著名的教会学校有：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女学；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改名为育英书院，此为之江大学的前身）；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斯在福州创办主日学校；1850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设徐汇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同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在上海设立文纪女塾；1853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设立格致书院；同年，天主教会在天津也设立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山东登州设立蒙养学堂、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在北京设立育英学堂……。这些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均以小学为主，规模较小，但它是我国近代新式学校和学生群的最早来源。

1868年7月，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该条约第7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这就承认了外国有在华设立洋学堂的权力，使帝国主义分子在华设立学堂合法化。从此，外国教会学校得到明显发展。据统计，1876年，仅基督教徒在华设立的学校总数就达350所，学生总数5975人；到1889年，学生总数增至16836人。^①此外，还有天主教会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到1897—1898年已达16571人。^②仅华北四省（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就有中等学校30余所，学生400余人，初等学校近500所，学生万人以上。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

①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74页。

② 同上第75页。

战前，教会学校猛增至 12000 余所，学生总数约 25 万人，比 19 世纪末增加 6 倍以上。尽管 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忙于厮杀，无暇东顾，但教会学校仍有较大发展。据 1921—1922 年“中华基督教教会调查团”的报告统计，基督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夕共 7382 所，学生数 214254 人。此外，天主教创办的学校也有 5600 余所，学生达 145000 余人；俄国东正教也办学 21 所学校，学生 680 人。同时，教会大学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建立起来的。如 1894 年创办的圣约翰大学，1901 年创办的东吴大学，1902 年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后与文华大学等校合并改称华中大学）；1903 年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1904 年创办的广州岭南大学，1905 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与燕京大学合并）、广州夏噶医科大学，1906 年创办的沪江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08 年创办的华南女子大学，1910 年创办的华西协成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1911 年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1913 年创办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5 年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1916 年创办的燕京大学，1917 年创办的齐鲁大学等。五四运动前夕，在华教会大学学生总数约 2000 人。

总之，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并随之产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新的学生群。到 1918 年，在华教会学校约 13000 余所，学生达 35 万人左右。这是我国第一批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新的学生群。

清政府自办的学校产生了又一批新式学生

清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其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制，在名义上也设有各级各类的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和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官学，地方有各级儒学——府学、州学、县学和大小书院，此外，还有各级各类私

人设立的“私塾”、“村塾”、“经馆”等。但由于清朝 200 多年教育之偏重于科举较明朝尤甚，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不过是科举的附庸，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处于内忧外患威胁之中的清政府也被迫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逐步做了一些改革。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图强”、“求富”为名，掀起了一场历时 30 年的洋务运动。为了“师夷长技”，洋务派在坚持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同时，注重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求制造之根本”，先后设立了一批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了办洋务的需要、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862 年，奕訢等在总理衙门之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主要学习“西文”。这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此后，李鸿章于 1863 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于 1864 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张之洞于 1893 年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等。二是为了学习“西艺”，培养军事和技术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性质的学校，如 1865 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校，1866 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74 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的操炮学堂，1876 年设立的福州电气学塾。此外还有：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天津水师学堂（1881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天津武备学堂和广东陆军学堂（1886 年）、台湾西学堂（1887 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 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 年）等等。这些学校有的一开始就开设一些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也有的如京师同文馆，虽属外语学校，但后来也增设了外国史地、数理启蒙、代数、物理、几何、机器制造等课程，其所学自然科学虽皆浅尝辄止，但范围已相当广泛。这些新学堂的创办，既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也改变了取仕的标准和方法，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把长期的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各界人士。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也提出了“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主张，不少人纷纷著文或上书，要求改变传统教育，兴办学校。如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曾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州府县学、省学、京师大学三级学堂；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提出：“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随着开办学校的呼声日高，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自19世纪末开始对传统的科举制度、书院等封建教育制度作了一些改良。一时间，一些新式学校陆续出现：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后改称北洋大学堂）；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1898年改为江南高等学堂），袁世凯创办新建陆军行营武备学堂，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经世学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杭州创设中西书院，陕西督学赵维熙在泾阳建格致实学书院（后更名为崇实书院）；1898年，光绪帝正式准设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同年，光绪还谕令各省府州县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改书院为学堂，兼学中西文化。嗣后，广西设立经济学堂，山西将令德书院改为省会学堂，江苏将江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省南菁高等学堂，保定畿辅学堂改为中学堂，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江西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浙江湖州、绍兴、温州成立崇实学堂和中西学堂等等。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血腥屠杀维新派人士，废除新政。但由于废科举、办新学已成为大势所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成为清政府在1901—1905年实施“新政”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重申前谕，要求各地切实将书院改为学堂，并

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制订并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学校分为七级：蒙养院学制为4年，初等学堂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各3年。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对后来学校教育影响甚大。1905年，清政府又正式宣布停止科举以广办学校。此后，中国政府自办的新式学校迅速发展起来。以湖南为例，巡抚俞廉三在1902年接到清政府兴办学堂的诏谕后，随即成立学务处，将求实书院（即前时务学堂）改为省城大学堂，并命各府州县开办中、小、蒙学堂。当时，善化、新化、湘潭等县开办学堂最多。到1903年，省会长沙又陆续开办了明德学堂、经正学堂、武备学堂和第一女学等。在河南，到1910年，全省有各类学堂3536所，在校学生近9万人；在湖北，各类学堂也纷纷成立，到1910年，仅武昌一地就有官立学校101所，全省学生数近10万人。除小学、中学、普通大学在全国普遍设立外，还设立了与中学并行的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优等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已达123所，学生22262人；到1910年，官立师范学校已达415所，学生达28572人^①。总之，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在清政府自办的一批新式学校中又产生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学生。但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创办新式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但在这些新式学校中，它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八股士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了桥梁和先锋作用。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2、185页。

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学校也产生了一批新式学生

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了。但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几乎无穷无尽的劳动力来源。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已有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象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对当时的八股取士和教育制度强烈不满，力主改革教育、兴办学校。他们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①，西方各国之“所以勃兴之本原”，就在于有兴盛的学校教育。为此，他们提出多设学校、广植人才的思想。在此影响下，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了“正蒙书院”，该校所设课程力图做到“系西人教科所长”，分设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等科目，并废去一般书院的括帖制义等功课。正蒙书院是我国近代私人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分科设教的新式学校，它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和要求。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涌现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并掀起了以变法维新为主要目的的维新运动。他们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康、梁等不仅大造要废科举立学校的舆论，而且还付诸实践。为了培养维新人才和传播维新思想，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严复等于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

1894 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谭嗣同于 1897 年在湖南创办“浏阳算学馆”；陈芝昌等在广州创办“时敏学堂”；吴怀疚等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学”、“经正女学”等。此外，此时期还出现了象湖南湘乡士绅开办的“东山精舍”、江西绅商蔡金台等创办的蚕桑学堂、陈宝琛在福州创办的东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尽管“百日维新”昙花一现，但维新派大力兴办新式学堂的一些主张和措施，却是深入人心的。

当中国进入 20 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摒弃了维新派的改良思想，高唱“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开始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为了革命的需要，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学校这块阵地，兴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并把学校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1894 年，孙中山先生在制定“兴中会”章程时，就提出了“立学校以育人才”的主张。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也大声疾呼，中国应兴学堂普及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不同，他们办学的目的是唤起全国人民的觉醒，并培养有志青年成为革命的先驱。他们把新式学校中的青年学生看作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学校是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1897 年冬，日本横滨华侨祁汝磐、冯镜如等倡办的华侨子弟学校（孙中山代定名为中西学校），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办学的最初尝试。同年，绍兴徐树兰捐款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蔡元培曾任该校监督、总理。1902 年 4 月，蔡元培、蒋智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该会的任务是设立学堂，编辑教科书，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同年夏，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校方压制言论自由，200 多名学生愤而退学。“中国教育会”受南洋公学退学学生之请求，于 11 月份在上海泥桥福源里创办“爱国学社”，专门接收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以及国内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同时，蔡元培还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同川学堂等新式学校。蔡元培等不仅利用这些学校来传

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为进行革命暴动作准备。如在“爱国学社”中组织义勇队、练习军操等。“爱国学社”等校对当时各地的革命思想教育影响很大，如当“中国教育会”鼎盛时期，江苏常熟及吴江的同里，均设有支部，常熟支部曾创办塔后小学，同里支部曾创办自治学社，并模仿上海爱国女校成立明华女校；苏州则设吴中公学社，杭州设两浙公学社，规模全仿爱国学社。此外，上海继爱国女学之后，又创建了泽丽学校。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国内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而且在国外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学校。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及退役军人教授军事，训练干部，学生入学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省加紧开设学校，以培养训练革命骨干。如贵州同盟会会员平刚、张忞、彭述之等创办寻常小学堂，浦藏锋创办乙己小学堂，张石麒创办光懿女子小学堂于贵阳；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等在绍兴设立大通学堂（后改称大通师范学堂），成为江浙一带的革命中心；同盟会会员高剑父等在江苏创办健行公学，宣传革命思想；山东的同盟会会员也先后创办了济南的山左公学、烟台的东牟公学、即墨的胶莱公学、高密的英林公学，以及沂州公学、棣州公学、东武公学等；同盟会会员温靖侯、谢逸桥等在广东梅县创办松口体育会（名为体育会，实则是革命党人进行军事训练、培训干部的学校），招生100余人；同盟会会员陈幼云在保定创办育德中学堂……总之，在同盟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兴建学校之风盛极一时。这些学校的创办为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并于1912年1月9日成立教育部。教育部成立后陆续颁布了若干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法令，对清末教育进行一些重要改革。如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可

以为女子另设中学或女子职业学校，允许私人创办师范学校，师范生免纳学费，并由学校酌给校内必要费用等。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但资产阶级致力教育兴办的新式学校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就是在1912年建立的。到1916年，全国共有新式学校121119所，学生达3974454人^①。这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学生群。

二、中国近代留学生的产生及近代学生群的特点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学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学生群不仅来源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清政府自办的新式学校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新式学校之中，而且还产生于留学生中。

“留学生”一词源于唐代。唐朝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日本政府为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来华。但“遣唐使”系外交使节，不能在中国久留，无法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因此，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起，同时派来了“还学生”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是指不办外交专门学习的青少年，他们必须随“遣唐使”回国时一块回国；而“留学生”则不受此限制，可以较长时间留在中国学习。此后，凡是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便统称为“留学生”。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国势鼎盛，文化先进，再加之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乃“天朝上国”的观念，所以，中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时间比较晚。

中国青年学生外出求学，最早始于1847年。该年，于马礼逊

^①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305页。

学堂求学的容闳、黄宽、黄胜等随其校长布朗赴美，进麻省芒松学校学习（黄胜因健康原因不久即返回香港）。1850年，容闳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毕业于该校；黄宽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毕业归国。可以说，容闳等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但是此时留学人员数量较少，且非官派，所以，正规化的留学生应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算起，到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人员已达4万多人。中国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赴欧美留学时期

1854年容闳从美国回国后，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拯救中国，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选派青少年赴美学习的建议。他认为，“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但容闳的建议未被清政府所采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清政府急需一批善于和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加之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也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因此，曾国藩采纳了容闳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上折，请求政府派幼童赴美。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并颁布了《招考章程》，决定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同年，容闳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堂，凡赴美幼童先入该校学习中西文字。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詹天佑、梁敦彦、容尚谦等30人，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出发赴美；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留学生蔡廷干、唐国安、吴仲贤等30人，由黄胜率领，从上海、香港两处启程（此次尚有广东7名自费留学生同往）；1874年11月17日，第三批留学生唐绍仪、周长龄等30人，由祁兆熙率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第23页。